

常青的“九叶”之树

——评霍俊明《九叶传》

□王祁睿恒

“九叶诗派”作为20世纪40年代的重要诗歌流派，其文学价值虽已得到诗歌史的经典确认，却一直缺少传记层面的综合展现。霍俊明新著《九叶传》的出版，让九位诗人的艺术人生得以完整呈现。该书不仅生动记录了“九叶”诗人彼此的真情，更清晰展现了他们各自的生命轨迹。尽管个体诗人终将凋零，但“九叶”之树在中国诗歌史中永远常青。

史料、诗学渊源和诗歌创作的有机整合

《九叶传》作为一部诗歌流派传记，其写作不是从一个诗派的兴起与演变出发，而是分别按照诗人去世的时间依次介绍穆旦、陈敬容、唐祈、曹辛之、杜运燮、辛笛、唐湜、袁可嘉、郑敏九位诗人的生平，并在每位诗人传记前附一页诗人的简明小传，其中包含诗人的最重要生平事迹和著作。这样的写法没有让《九叶传》成为九片叶子的标本展柜，而是真正以一棵树的姿态让九位诗人各自在自己的枝干上散发出一生的高光。

在内容编排上，虽然《九叶传》从每位诗人的传记出发，却更简明集中地让我们看到了整个“九叶诗派”的发展，这种写作方式忠实地顾及到了九位诗人身份背景、诗歌资源和创作风格的独立性，如书中所说“值得注意的是这九位诗人无论是在性格还是风格上都是存在差异的，所以我将它们比喻为‘众声独唱之树’”，《九叶传》也因此避免了将九位诗人放在一起讨论而将诗人扁平化的问题。同时，《九叶传》最可贵之处还在于作者对诗人的生活现场与诗歌有着诗人的精准解读。这种写作方式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美国作家帕特丽卡·劳伦斯的《丽莉·布瑞斯科的中国眼睛》，同是在现代主义的背景下，这本书以英国作家的视角深入英国“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与中国“新月派”的艺术对话，在发现更多珍贵史料的同时又让一个诗歌流派焕发了艺术的光彩。《九叶传》在写作时秉持了这种广阔而细致的艺术笔法。在穆旦一章，作者为穆旦一生的履历奠定了“为永远的迷蛊惑着的绿色火焰”的基调，并引用陈超的《论意象与生命心象》与《生命诗学论稿》，将穆旦、西南联大与狄兰·托马斯联结起来。作者将史料、诗人的诗学渊源和诗歌创作有机整合在一起，在这种互

相打开的命运伙伴关系中娓娓道来九叶诗人的一生。

透过一片叶的脉络看到整棵树的繁茂

《九叶传》首先提供了进入“九叶诗派”的历史语境与关键切入点——飘零。“飘”是诗人们的四处漂泊，“零”是诗人们身在其中难遣的深深孤独。从序言“风雨中众声独唱之树”、唐祈的“半生风流半漂萍”、杜运燮的“成熟的鸽哨与时代气旋”和唐湜的“孤独中驾一叶幻美的轻帆”这些章节标题可以看出，作者准确地抓住了1940年代中国时代气氛与当时知识分子漂泊般无依的孤独感。作者以他们的关键经历为引子和桥梁，通向“九叶”诗人之间的友谊和诗歌内部。

在《九叶传》中，友情与爱情被作者从不同的侧重点交错地展现出来，如在穆旦一章中，作者对于穆旦的西南联大岁月侧重于从诗人“三千里步行”与参战经历进行描摹，充满热血和激情，而在杜云燮一章中的西南联大岁月，作者却将视点放在了杜云燮和沈从文、穆旦与郑敏等的师生友谊和组建文艺社团的经历，是“物质匮乏而精神富足的校园岁月”，二者彼此呼应，反映了当时校园岁月的两面，也真实地反映了不同诗人各自的性格与气质。作者在这本综合性传记中并没有以史料集合的形式来进行顺序排列，而是采用了传主本人的生命历程与诗意的叙述节奏交错展现的方式，在读某一位“九叶”诗人的一段经历时，经常能在书中找到另一处相同时空的参照与对话，透过一片叶的脉络可看到整棵树的繁茂，在他们虬结交错的命运下不断逼近“九叶”诗人的灵魂深处。

诗人之死与火烈鸟的涅槃

2022年最后一位“九叶”诗人郑敏仙逝，《九叶传》在纪念“九叶诗派”的同时也严肃面对诗人与死亡的关键问题。在唐祈一章中，作者动情记述了他拼命工作，即便身体出现了问题，也不忘与陈超等诗学家商议共同编辑出版《中国新诗名篇鉴赏辞典》，而长时间超负荷的工作让唐祈倒在了病床上。纵观“九叶”诗人的离开，作者引用郑敏的《诗人与



《九叶传》，霍俊明著，花山文艺出版社，2025年4月

死》对其进行了诗意的表达，书中的他们仿佛是一只只孤独的火烈鸟，踽踽独行，没有发出一声悲鸣。

作者在书的最后引用郑敏的诗《最后的诞生》写下了“九叶诗派”最后一位诗人凋零的场景，而这因诗获得的新生却不仅仅是郑敏一个人的，而是整个“九叶诗派”最完满的归宿。同时作者依然不忘对诗歌良知的渴求与呼唤。九位诗人的一生被浓缩进了23万字的《九叶传》中，对于一首诗的体量来说，它太长，而对于九位诗人的一生，这部《九叶传》又像一首精炼的人生之诗。读罢掩卷，仿佛又回到了穆旦的《春》，也许这被点燃而无处归依的命运，早已为他们说出了火烈鸟般的命运谶语。

“蓝天下，为永远的谜迷惑着的
是我们二十岁的紧闭的肉体
一如那泥土做成的鸟的歌
你们被点燃，却无处归依”

（作者系河北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

青春的价值在于永远向前的勇气

□梁 好

曾高飞常年在财经和文学领域笔耕不辍，他始终恪守“躺着思考，坐着写作，站着做人，跑着逐梦”，坚持“左手财经，右手文学，用作品说话”的信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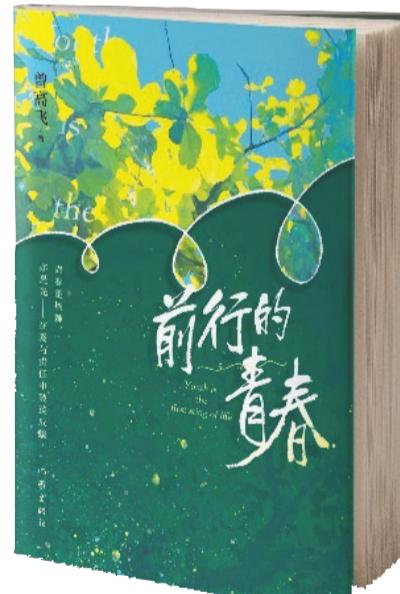
在《前行的青春》里，曾高飞写出了我们共同生活的环境，写活了我们共同经历的年代。他笔下的仇晓梅、肖小燕、林婉儿、陆贵等青年，在成长中蜕变、在责任中觉醒，鲜活地勾勒出一代人的青春轨迹与青春底色。

《前行的青春》是一部充满爱和能量的作品：仇晓梅在镇汽车站捡到身患重病、被亲生父母遗弃的仇拾，出于善良，她将其带入校园一边求学，一边打工。而宿舍其他女生对小孩的顽皮很排斥，并由此引发种种矛盾；经济上的困窘迫使她在学业和养育孩子间艰难平衡，不得不在饭店推销酒水来养育仇拾。而后仇晓梅不幸染病离世，更是将命运的悲剧推向高潮。曾高飞是个内心善良和充满悲悯情怀的人，他不忍直面苦难，而是通过爱与责任的书写赋予这部小说超越性意义。

仇晓梅对仇拾的爱与责任是生命对生命的救赎。仇拾因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被亲生父母抛弃，使他变得自卑、敏感又脆弱；而仇晓梅的父母在返乡途中遭遇车祸双双离世，意外遭遇为她带来无法承受的生命之痛，失去至亲的她曾陷入绝望的深渊，甚至萌生轻生念头。两人都失去至亲至爱的人，成为同病相怜的孤儿。正是他们高度契合的人生命运和情感曲折，使得彼此情感互补、灵魂互通。“在父母去世后的那段日子，仇拾成了仇晓梅活下去的坚强理由和有力支撑……她跟仇拾同病相怜，同命相系，都成了孤儿。”仇拾也因为仇晓梅无微不至的照顾逐渐变得聪明、活泼、开朗起来，待人接物彬彬有礼，改掉了以往的毛病。仇晓梅在自己人生最低落、情感最脆弱的状态下，却将仇拾领向一条充满温情和希望的道路。因为人性本能的情感需求和善良驱使，弥补了他们的情感和精神空虚，从而相互照亮，彼此温暖。

从《小镇青年》中乡村青年的命运抗争，到《前行的青春》里都市青年的精神突围，曾高飞始终关注个体在困境中的成长可能性。小说以主人公的精神追求和自我实现为未来的发展指明方向，书写他们即使深陷困境却仍然向上向善、坚毅奋进，给人带来精神曙光。

除仇晓梅之外，520宿舍其他三位女生贺怡、肖小燕、林婉儿最初对仇拾充满反感和厌



《前行的青春》，曾高飞著，作家出版社，2025年7月

恶，然而当她们得知仇拾是被遗弃的孤儿并身患重病时，怜悯油然而生并主动加入照顾仇拾的行列中来。在这个过程中，她们学会了关心他人、承担责任，逐渐褪去了当初身上的稚气。

同样，1314宿舍的曾枭、陆贵等男生，在与仇拾接触中，也经历了成长的蜕变。曾枭起初对仇晓梅和仇拾的事情并不了解，但在与仇拾相处中被其天真可爱所打动，逐渐对这个孩子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当陆贵因照片风波而训斥仇拾时，曾枭为维护仇拾，与陆贵发生肢体冲突。看似简单的矛盾纠纷，事实上是曾枭内心对正义和责任的坚守。仇晓梅去世后，他主动接过抚养仇拾的重任，并在这个过程中从一个懵懂的少年，逐渐成长为一位有责任感、有担当的男子汉。而陆贵在经历此次事件后，也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从冲动鲁莽逐渐变得成熟稳重。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在面对生命中的种种磨难时，也经历了内心的成長与蜕变，实现了从稚嫩到成熟的跨越，从脆弱到坚强的升华，凸显着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一个大的变动、充满主体意志和不同想象的时代，各种价值观和人生观的碰撞、命运和人生境遇的变化，也一定会在爱情的场域有所反应。仇晓梅与曾枭始于陌路、终于生死的爱情。

情羁绊；陆贵与肖小燕的爱情，是在相互支持中不断成长，他们相约一个保家卫国，一个回乡创业，展现出当代年轻人对爱情与责任的理解；贺怡与方明的爱情则充满波折与考验。贺怡因为经济上的困窘，在面对爱情时小心翼翼，她努力偿还债务，为的是能够平等地站在方明面前，这是对爱情的慎重和坚守。

小说在青春叙事中还融入了对社会现实的思考。小说最后，仇晓梅的去世，既是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创伤的缩影。真实可感的细节描写，将青春叙事融入宏大的时代背景中，又赋予小说纪录片的质感。但曾高飞没有止步于单纯的苦难描写，而是在困难中书写人性的光芒：仇晓梅不幸染病后，大家对仇拾尽力照拂，以及为仇晓梅和曾枭举办线上婚礼，都彰显着青年群体在困难面前的温情与凝聚力。

小说中的时代性还体现在青年的认知更迭中：肖小燕毕业选择回乡承包山林水库，既是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响应，也体现了新一代青年对“故乡”概念的重新定义：他们不再将城市视为唯一的梦想之地，而是在城乡融合中寻找发展机遇，这种新视角突破了传统青春文学的“城乡二元对立”模式，展现出Z世代青年具有前瞻性的时代认知。这与曾高飞另一作品《小镇青年》中的张美生形成呼应。《小镇青年》是新世纪初乡村青年在城市化浪潮中的主动突围，《前行的青春》则是新时代青年在乡村振兴战略下的价值回归，两组不同时代的人物凸显出作者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在阅读过程中，我时常产生时空交错的恍惚。那些关于宿舍矛盾、学业压力、求职焦虑的描写，既是对特定年代的真实记录，也暗含着超越时代的青春本质。正如曾高飞在自序中说：“窃以为‘前行’二字既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大缩影，也体现了我们这一代人普遍的人生态度……‘前行’既是我们生命的内在需求，又是一代代中国人不懈追求的真实写照。”他反复提及的“前行”二字，不仅是小说主人公们穿越困境的生命姿态，更是一所大学、一座城市乃至整个民族的精神写照。仇晓梅的离去并非故事的终点，而是精神的延续——曾枭接过抚养仇拾的责任，贺怡与方明投身大西北建设，陆贵成为保家卫国的飞行员，这些未完待续的故事都在诉说着同一个真理：青春的价值不在于完美的结局，而在于永远向前的勇气。

（作者系作家、评论家）

近年来，放眼江苏省乃至全国的报告文学领域，章剑华都可算是异军突起的作家。短短数年间，他先后推出了《故宫三部曲》《大江之上：长江大桥建设三部曲》《世纪江村：小康之路三部曲》《向苍穹：中国天文发展三部曲》《经典之城：苏州人文经济发展三部曲》等多部极有分量的报告文学作品。章剑华的作品往往具有宏大的历史视野、深邃的时代特质、厚重的选题立意以及生动的文学表达。他的创作实践对当下报告文学的研究有着独特又丰富的价值。

题材选择：立足重大主题，书写现实样本

章剑华的创作始终围绕“重大题材”展开。《故宫三部曲》记录的是故宫文物南迁的故事，再现了抗战时期故宫人为守护一万三千余箱国宝，跨越半个中国的壮举。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这批珍贵文物竟无一损毁，创造了世界文物史上的奇迹。《大江之上：长江大桥建设三部曲》记录的是新中国成立后长江大桥的建造历程，从最初依靠苏联援助到实现完全自主设计，从技术落后到跻身世界桥梁建设前列，长江大桥的建设也印证了新中国的崛起，是共和国伟大成就之一。《世纪江村：小康之路三部曲》记录了费孝通笔下的江村——开弦弓村，在世纪变迁中追求小康生活的曲折探索，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实现被誉为“人类发展史上伟大奇迹”的全面小康的现实缩影。《向苍穹：中国天文发展三部曲》记录的是数千年来自中华民族仰望星空、驰骋银河的梦想与执着，重点展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天文事业从跟跑到领跑，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经典之城：苏州人文经济发展三部曲》着眼于被誉为“人间天堂”的苏州市，深入挖掘并描绘了该市的千年脉络和未来图景，是中国人文经济发展的现实样本。

故宫文物、长江大桥、全面小康、天文事业、人文经济……章剑华的“三部曲”系列作品涉及题材缤纷多样，但每个都恢宏气派、内涵丰富，既有立足大地的乡土实践，也有逐梦苍穹的浪漫情怀，既有书写文化传承的民族记忆，也有反映工业技术的辉煌跨越，恰如绚烂的阳光，折射出党和国家百年来的奋斗之路。这些题材的背后，是我国在不同领域取得瞩目的成就的生动写照，也彰显出中华民族如今屹立于世界之林的实力与底气。

写作手法：纪实性的严谨，文学化的处理

报告文学的写作讲究“大事不虚、小事不拘”，意味着在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时间节点上必须确保真实性，这也是其区别于小说等文体的关键所在。

章剑华的“三部曲”系列作品中，对真实性的追求贯穿于创作全过程。在创作谈中，他经常提及一个词——在场感。这种“在场感”，不仅是针对读者的阅读体验，更是他创作理念的直观体现。在海量查阅和研读资料的基础上，章剑华尤为重视第一手资料的获取。如在创作《故宫三部曲》时，他多次往返外地，采访当年参与文物南迁的人员。撰写《世纪江村：小康之路三部曲》时，他九访江村，与当地领导、村支书、村民等进行深入交流。在创作《向苍穹：中国天文发展三部曲》时，他竭尽所能，广泛联络，陆续采访了15位中科院院士，只为获取最新鲜、最真实、最前沿的素材。在写作《经典之城：苏州人文经济发展三部曲》时，他十访苏州，跑遍了苏州各个区县，还专程奔赴北京、上海等地，与亲历者面对面交谈。“耳濡”的同时还有“目染”，他坚持到第一现场，置身于原址，以第一视角找寻第一感觉。创作《大江之上：长江大桥建设三部曲》时，他实地造访南京长江大桥、武汉长江大桥、江阴长江大桥等各座桥梁。采写《向苍穹：中国天文发展三部曲》时，他先后赴北京古观象台、南京紫金山天文台、中国天眼、青岛观象台、云南昆明凤凰山天文台、河南登封周公测景台等多处古今场址，在事发地与当事人进行

穿越时空的“对话”。而他对这些第一手资料的吸收消化，均通过文字严谨地呈现出来，奠定了“三部曲”系列对所涉及领域在文学层面开创的先发意义和史料价值，这也是作品得到专家认同和读者认可的成功密码。

在报告文学的创作中，如何处理“报告”与“文学”的关系，是作家工作底和水平高低的体现。对于一部优秀的报告文学来说，两者一定是辩证统一的融合。“报告”是形成作品的立身之本，“文学”则是吸引更多读者的魅力所在；“报告”是理性的表达，“文学”是感性的抒发。虽然章剑华经常流露出“自己并不是专业作家”的自我评价，但在他的“三部曲”系列作品中，文学性还是有着很鲜明的体现，在情节设置、冲突推进、场景还原、人物对话等各个方面，均体现了他的文学功底。如《故宫三部曲》中对马衡、易培基等知识分子与保守派争论场面的刻画，《大江之上：长江大桥建设三部曲》中对梅旸春临危前放不下未尽大桥事业的心理挣扎的书写，《世纪江村：小康之路三部曲》里对费达生与郑辟疆情感纠葛的细腻呈现，《经典之城：苏州人文经济发展三部曲》中对于工业园区选址及建设过程的深层描述，以及文中的虚构人物、补充情节等，都体现了作者对事实和情感的把控。对于立足史料的报告文学系列作品而言，这些文学性的处理更像调味剂，在保证原汁原味描绘事件的基础上，显著提升了可读性，且因为有了文学性的参与和渗透，也更易引起读者的心理共鸣和情感共振。

内容呈现：敏锐的时代洞察、浓郁的文化情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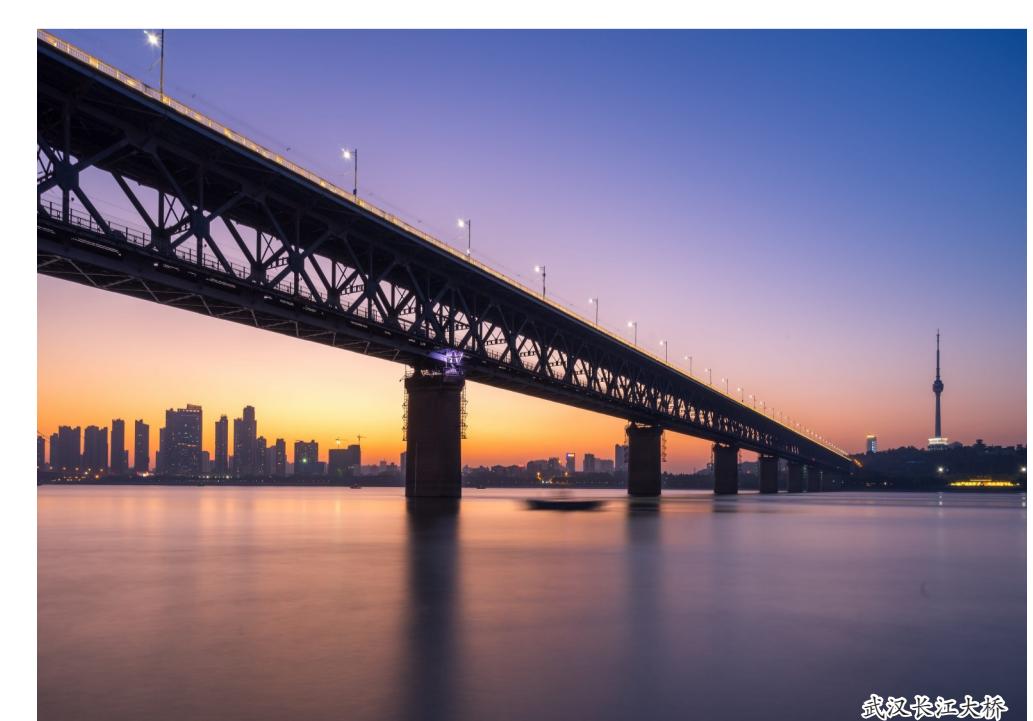
江苏报告文学作家中，章剑华的身份和经历比较特殊，他曾在多个文化单位任职，这使得他有着独特的题材敏感性和视野宏阔性。这一点，从他提取选题的精准度中便能体现出来。如当看到南京朝天宫下的文物时，他立刻想到文物南迁的波澜历史，随即开始创作《故宫三部曲》。看到南京长江大桥维修完毕，市民纷纷涌上大桥参观的盛况后，当即迸发灵感，决意以长江大桥建设为题材，创作献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作品。在全国上下决战全面小康之际，他通过深入思考，选择以“江村”小切口关联“小康”大主题。从这些题材的选择可看出，章剑华的目光始终坚毅、始终向前，广袤又富有穿透力。他从不局限于一隅，而倾向于将视野投向具有厚重历史感、鲜明时代性、广泛影响力的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中意于那些既凸显江苏元素，又获得全国关注，更产生世界影响的关键成就。他不随大流，而是通过自己的思考，另辟蹊径，使得每个“三部曲”关注的角度令人耳目一新，既在情理之中，又在预料之外。

章剑华的追求还不止于此。他不愿仅做一名记者，为读者“播放”过往的历史片段，更希望成为一名思考者，在文本之外，为时代与社会的发展提供自己的洞察与见解，并向读者呈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我们面向未来的根基与自信。正是这种大情怀，成就了作品的大气魄，使人读起来荡气回肠，深受鼓舞。

章剑华有着浓郁的文化情结，这份情感注入作品中，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对知识分子的关注，他称其为“中国脊梁”。不论是一生捍卫中华文化的马衡，还是毕生投身造桥事业的梅旸春；不管是一辈子为了农民致富、乡村振兴的费孝通，或是呕心沥血托举中国天文事业的张钰哲，以及青丝变白发的苏州城市规划建设者们，他的赞誉之情都汩汩流淌。通过作品，作家向读者传递出一种认知：这些知识分子是中国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的脊梁，正因为有了他们，国家才有了阔步向前的动力与希望。

洋洋百万字，句句赤诚心。章剑华的作品既有契合当下瞬间的精彩，更具有钩沉历史洪流的厚重，而其中最闪亮的内核，便是对他国家和民族的深沉自豪感。这种澎湃之情贯穿在作品对历史的凝望中，流淌在创作时挥就不停的笔端下，是章剑华对时代的深情告白。

（作者系《江苏作家》编辑）



武汉长江大桥